

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

中国高等教育史

郑登云 编著

(上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高等教育史

上册

郑登云 编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 201 号

中国高等教育史

上 册

郑登云 编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80 千字

1994 年 4 月一版

199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1—3,000 本

ISBN 7-5617-1170-0/G·506

定 价: 5.45 元

序

中国高等教育史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确定它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总结实践家、思想家、理论家在这一领域所作的贡献，评价它在发展长河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是非得失，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进行国际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推进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以及我们正在从事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是一项意义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中国高等教育史》是列入国家教育委员会一九八五至一九九〇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的教学参考书。根据现实的需要，我们把重点放在近代、当代部分的研究。但历史有其发展过程与内在的逻辑联系，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与丰富的历史经验，为保持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完整性、系统性，特请张惠芬教授撰写了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作为本书上册的第一个专题。她以广博而精深的学识水平，在有限的篇幅里勾画出了历史发展的轮廓，并评价其是非得失，让读者了解中国古代大学教育的形成、发展以及与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联系。这样，本书虽然只写了上册近代部分和下册当代部分的高等教育，仍不失为贯通古今的中国高等教育史。

本书的作者力求遵循以下原则：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以史实为根据，联系中国各个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实际，考察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历史经验；以历史概述与专题研究形式编排，既展现历史发展，又选择每个历史阶段发生的重大历史事实和教育制

度的重大变化进行专题研究，使观点与材料统一，论从史出，人从史出。纵观全书，这些原则是体现无遗的。郑登云教授所写的上册，既按历史顺序，以翔实的史料论述其发展线索，又突出重点和典型，形成整体结构体系，史论平实，以史料见长，反映了近十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至于下册，我在它的前言与后记中已有说明，这里恕不赘言。

这部教学参考书的读者对象为高等学校的管理干部，高等师范院校教育专业的教师、大学生和研究生。作者编写时在充分考虑其科学性的前提下，注意到它的工具性、资料性、可靠性。对于某些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有不同观点的，作者一方面不回避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又让事实说话，由读者自己作出正确的判断。

写一部好的教学参考书是很难的，但唯其难就得有人去做，有众人去做。这部书的写成，就其下册而言，只是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它不是终结，而应是新的起点。这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力量尚不适应工作的要求，特别是当代高等教育，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根据党中央的要求进一步改革与发展，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思想有待深入研究，进行科学实验；即使是历史经验回过头去再思考，还会有新的认识。实践在发展，人们的认识亦在发展，教育理论必然随之而发展。希望本书的问世能引起更多的同行、学者和大学生、研究生们，携起手来共同研究，为繁荣高等教育科学，概括新的理论，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而奋斗。

余 立

1993年3月于上海

前 言

《中国高等教育史》，是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中的一种，分为上下两册，本书为上册。

具有严格意义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是从近代才开始的，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物。这里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是指建立在初等和中等教育基础上的专门教育。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是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而产生的，以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为标志。但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古代大学教育，近代高等教育，也是在古代大学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让读者对这段历史有比较完整的了解，特请张惠芬同志撰写了中国古代大学教育专篇，作为本书的第一个专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各领域都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有一部分开明的地主阶级官员和有识之士，开始放眼世界，提倡向西方学习，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师夷”来克服被“夷”所制的困境，他们认为这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必经之途。自此之后，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文化教育，被作为资本主义“新学”而逐渐地在中国传播。在中国近代史上，要不要学习西方，向西方学习什么，以及如何学习等一系列问题，通常表现为“西学与中学之争”、“学校与科举之争”。而“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这种新与旧之争，反映了尖锐的封建与反封建的斗争。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史，就

是在“西学东渐”、新学与旧学之争的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清末、民初的高等教育也就深深地烙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诚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①作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高等教育，就其性质而言，正是带有这种属性的。

这本《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册，研究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0年间期间的高等教育。近代中国教育处在严重裂变和不断的新旧冲突之中，表现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教育。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高等教育，经历了起伏而曲折的进程。本书着重探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轫。

本书力图反映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并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服务。我们在撰述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观点与材料的统一，考察与探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沿革与变迁，史料务求准确可靠；每一个专题的记述，力求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相结合，坚持“论从史出”的科学态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与吸取了中国教育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余立同志为本书作序，张瑞璠教授对本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给予了支持和帮助，使本书得以出版，特在此致以谢忱。

限于作者水平，书中的不足之处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郑登云

1992.6.于华东师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91页。

目 录

一、中国古代大学教育	(1)
(一)先秦时期的大学教育	(1)
(二)封建社会大学教育的发展	(7)
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轫	(19)
洋务学堂	(20)
京师同文馆	(29)
福建船政学堂	(36)
三、京师大学堂的创立	(49)
京师大学堂的缘起	(49)
京师大学堂的发展概况	(53)
京师大学堂学生的爱国运动	(62)
京师大学堂的主要特征	(67)
四、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	(70)
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肇始	(71)
清末高等教育的结构	(76)
清末高等学校的立学宗旨	(79)
清末的高等学校	(82)
五、近代高等教育的拓展	(96)
《专门学校令》和《专门学校规程》的颁行	(98)
《大学令》和《大学规程》的颁行	(100)
民国初年的高等学校	(110)
蔡元培的北大改革	(121)
六、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定型化	(140)
《修正大学令》、《国立大学条例》的颁布	(140)

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特点	(144)
北洋军阀对高等学校的摧残	(146)
北洋军阀时期的高等学校	(153)
七、近代教会大学	(166)
近代教会大学的缘起	(167)
清末的教会大学	(174)
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	(182)
近代教会大学风潮	(201)
八、近代私立大学	(206)
清末的私立大学	(206)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概况	(213)
近代私立大学的特点	(224)
九、“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	(228)
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	(228)
“三民主义教育”阶段的高等学校	(234)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等教育	(246)
国民党统治区高等学校师生爱国民主运动	(261)
“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体制的特点	(267)
十、无产阶级新型大学	(275)
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的革命大学	(275)
中央苏区的大学	(287)
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革命大学的发展	(295)
无产阶级革命大学的特点	(318)

一、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

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因为近代高等教育是近代学制确立后的产物。但是，古代却有发达的大学教育。古代大学教育和近代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着不可割绝的历史联系。其一，两者都是不同时期国家的最高层次的教育，为社会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其二，近代高等教育是在古代大学教育这个基点上改造发展，带有深刻的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烙印。因此，在系统叙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前，有必要对古代大学教育作一简要的概述。

（一）先秦时期的大学教育

据古文献的记载和最新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早在奴隶制国家西周时期，已有了小学和大学的建制。西周的大学分为三种类型：一名辟雍，是天子设立的大学；一名泮宫，是诸侯国建立的大学；一名畴学，是天子王宫中负责天文、水利、建筑、制造等各种技术部门官吏们的父子相传的教育形式。前二者培养上至天子下至大夫等各级执政者和政务官员；后者培养技术事务官员。西周统治者奉行“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国策，三类大学中，以辟雍地位最高，历史文献记录也较多，对后世的大学教育影响也最大。其它二类大学所留下的历史资料，仅仅片言只语。

辟雍的入学者，限于王太子、王子，诸侯、大夫们的嫡长子，以及统治族中平民阶层的“俊秀”。

辟雍教授的科目是：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学科，史称“六艺”。

礼，即周礼。内容广泛，主要指奴隶制社会的宗法制、等级制、世袭制、分封制等典章制度；以孝、悌为核心的宗法道德观念；体现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的礼仪以及礼器乐器等等。

乐，即音乐。包括唱歌、舞蹈和演奏乐器。唱歌的歌词就是诗，有风、雅、颂之分。风是地方音乐，雅是宫廷音乐，颂是宗庙音乐。

射，即射箭。关于射箭技术，有系列的指标规定。

御，即驾御战车。关于御的技术，亦有一系列的指标规定。

书，包括读写和阅读政治、历史文献的能力。

数，包括记数和计算能力。

“六艺”，囊括了奴隶社会的全部文明，设官专守。王宫以外，既没有文化典籍，也没有礼器和乐器。教师，由有关文、武官员兼任、官师不分。

“六艺”教育，以礼乐为中心。这是以周公旦为首的西周奴隶主统治集团的“敬德保民”的政治主张在大学教育方面的延伸。周人虽然承继了商人上帝的观念，试图以上帝的意志、神的权威，从心理上慑服被征服的商贵族和其它被沦为奴隶的氏族，但他们更珍视从商纣王的覆灭和周武王兄弟的叛变的历史事件中总结教训，认识到对于统治集团来说，上帝是不可信赖的，只有凭藉执政者本身的道德水准、勤政惠民，并认真地对统治族成员进行孝悌道德教育，才能维护统治族内部的团结，从而取得被征服的氏族的拥戴。他们制造了“敬德配命”的舆论，宣扬商纣的失天下，是由于他失德残民，激怒了上帝，因此上帝改换了命令，让仁慈的周文王取商纣王而代之。周文王的子孙们，如希望保持天命不变，唯有修德。礼乐教育，正是用来培养有德君子。所谓“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①。礼，是奴隶主统治集团提出的政治和道德原则，用作“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②；是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孙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它是外在的不可变易的标准。乐，则是配合礼，培养人的道德感情，通过乐教，使外在强制性的政治、道德原

① 《礼记·文王世子》。

② 《礼记·曲礼》。

则，转化为人们内在的一种精神需求。辟雍教育完全适应了周代的政治要求，充分发挥了大学教育的政治功能，促进了西周奴隶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著称于史的“成康之治”，是实实在在的政教不分。近代学者将西周的文化教育的上述各种特征，概括为“学在官府”。

随着奴隶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奴隶制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是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诞生的社会剧变时代。这一新陈代谢的过程，是通过连续不断的残酷的战争形式而行进着。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学在官府”的局面被突破，士和私学在历史上破土而出。

由于西周奴隶主政权的动荡和衰败，原守藏在宫廷中的文化典籍、礼器、乐器等，逐渐散失到民间；与此同时，宫廷中的文化官吏也不断流落四方。即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意思是说周天子的文化官吏四散了，文化学术也随他们扩散到四方去了，这就是历史上出现的进步的“学术下移”的趋向。官学衰废了，而这种流散在四方的王官，失去了世袭的特权，他们既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食人者”，却又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载体，为了糊口养家，唯有出卖知识，这就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与王官分离的士的“雏型”；而在社会剧变中没落的贵族子弟，新涌现出来的新兴地主分子和挣脱奴隶枷锁的自由民，又需要学习文化知识，这两种主客观条件的结合，授受关系建立，私学就这样诞生了。

私学最早出现在齐国和鲁国，时间约为春秋中期。齐鲁是传统文化影响最深又是最早实行封建剥削的诸侯国。不少学者认为《庄子·天下》篇中所提及的“搢绅先生”，就是历史上最早的私学老师。士的出现与私学的萌芽、士阶层的形成与私学的发展，既是同步进行，又是互相促进。士阶层一出现于社会，就要研究社会，观察政治，兴论立说，反作用于社会和政治；而纷争的社会又需要理论给予解释和指引。由于受不同阶级利益的驱使和对学术资料的取向不同，形成了诸子学派，著名的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

家、兵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小说家等十家，开创了“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景象。名家学派都收徒教学，故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有两重意义：一为学术派别，多数侧重于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一为教育团体，即学校。这种具有双重意义的私学，可以说是由郑国的邓析、鲁国的少正卯和孔丘等所开创。私学的诞生和发展，是中国古代大学教育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它与西周官学不同。

第一，私学是与官府分离的，它是独立的专门的学术和教育团体。

第二，私学不是传递官府规定的教学科目，而以本学派的政治和学术主张教授弟子，并希望弟子们学成入仕，辅助国君、大夫，将本学派的政治理想付诸实现。所以私学弟子们的参政意识很浓，甚至认为“不仕无义”^①。

第三，受教育对象扩大，突破了王族、奴隶主贵族的族类限制，基本上都本着“有教无类”的原则，吸收平民入学。

第四，私学大师与王官分离，不享有世官世禄的特权，属于士的行列。

从大学教育这一角度上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办得较成功的私学，当数孔丘的私学、墨翟的私学、老聃的私学、孟轲的私学、庄周的私学、荀况的私学和齐国的稷下学宫等^②。这些私学在中国古代大学教育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灿烂的一页，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如：建立了各家学派，提出了各种哲学、政治和社会学说，创造了多种文学流派；培育了成群的杰出人才；奠定了中国古代大学教育的理论基础，在这一方面，建树最多的则是儒家学派的孔丘、孟轲、荀况，后人尊称他们为孔子、孟子、荀子。

儒家是西周以来传统文化教育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无论孔子、

① 《论语·微子》。

② 稷下学宫，虽由齐国国君所设立，实质上是各家私学荟萃之地，并不是西周式的辟雍，也不是后来汉唐式的太学。

孟子、荀子，他们在政治上都力主德治，鼓吹贤才执政，以礼立国，重视教化在治国理民中的作用。只是三人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不同，在理论形式上，各带有自己的特殊的历史色彩罢了。他们在教育上的业绩是：

第一，提出了培养“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才。这种理想人才，在孔子那里称为“君子儒”，在孟子那里称为“大丈夫”，在荀子那里称为“大儒”。尽管称号各不相同，其内在的结构条件则基本相同。所谓“内圣”，指人的高度的道德修养。首先是“志于道”，即要求学者立志固守儒家的政治理想。为了“道”的实现，在价值取向上，必须坚持“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①，必要时，勇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其次要具有以孝、悌为核心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儒家认为国君或执政者的道德水平是进行政治统治的基础。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②孟子将人的同情心，“即“不忍人之心”，作为推行他的仁政的起点。所以儒家学派毫无例外地把道德教育放在培养贤才的首要地位。但是，“修己”旨在“安百姓”，“内圣”是为了“外王”，建立事功，以变“无道”的天下为“有道”的天下，故儒家又十分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和从政能力的培养，要求学者善于“以古持今”，“以一持万”，“明振毫末”，“举措立变而不穷”，即不仅要掌握系统的知识，而且应具有相当高的理性思维和判断能力及应变的才能。“内圣外王”的实质，可以说是仁和智的结合，这是儒家理想人才的显著特征；而“修己以安百姓”，则是儒家培养人才的基本原则，“学而优则仕”是儒家办学的根本宗旨所在，虽然他们一再宣扬什么“天下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则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二，系统地整理了夏、商、周以来的文化典籍，分别形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本私学教材。

① 《孟子·滕文公下》。

② 《论语·子路》。

《诗》，是西周以来的诗歌选编，即流传至今的《诗经》。孔子曾说过他整理《诗》的基本方针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①。

《书》，是孔子收集自尧舜时代至夏、商、周的政治文献汇编而成，即流传至今的《尚书》。

《礼》，是孔子从周代礼仪制度中辑辑出来的“士礼”十七篇，即流传至今的《仪礼》。

《乐》，乐曲，与诗相配，今佚。

《易》，经孔子以下儒生们的修撰，至战国末才成书，即流传至今的《易经》。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编年史修改而成。其基本点，是正名定分，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这些典籍，保存了古代历史、政治、风俗道德、文化科学等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而其中，更集中记录着夏商周三代奴隶主阶级治邦安民的经验和教训，是儒家私学弟子们进行道德修养和从政的必备的文化知识。秦汉以后，被历代帝王御定为大学教材。

第三，在他们创建的人性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大学教育、教学方法，诸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结合，改过迁善，身体力行；尚志，存心养性，由博反约，深造自得，反求诸己，动心忍性；积渐全尽，治气养心，隆师亲友……等等，这些教育、教学方法的共同特征，则是知识摄取和道德修养的有机统一。

约成于战国中后期的《大学》和《学记》，是儒家学者对西周的大学教育和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私学的教育主张和实践所作的系统的全面的总结。前者，着重论证了大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大学》作者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大学的任务首先使学者发扬光大自己的光明道德，然后去影响人民，形成他们至善的道德，从而达到天下太平。所以“修身”是执政

^① 《论语·为政》。

者通向“平天下”的出发点和基点，所谓“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而修身的起点，则是“格物致知”，先进行道德的认知，然后使自己意念真诚，心思端正，进入修身。所谓“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后儒将上述思想，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

《学记》着重记述了大学教育的作用、体制、教学计划、管理原则、教学方法和作为人师的基本条件及其应有的社会地位。

《大学》、《学记》这两篇姐妹作，不仅仅是中国大学教育史上首创的大学教育专著，也是世界教育史上首创的大学教育论著，直接影响秦汉以后的太学教育和书院教育。

活跃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私学，作出了无愧于他们时代的卓越贡献，为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开辟了道路。然而，当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秦朝建立以后，他们自身却被禁止活动了。

(二) 封建社会大学教育的发展

自秦至清中叶，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在封建社会历史阶段停留之长，举世罕有。而封建时代的大学教育在延续封建制度这一历史过程中，皆起过特殊的作用。封建时代的大学，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形式：以培养封建国家行政官吏为任务的中央官学；以训练法律、科技和艺术专门人才为目标的中央专科学校；以传递经学、科技和文化艺术为宗旨的私人授徒及家学；以培养学术人才为宗旨的书院。自隋唐兴起科举取士，则科举考试成了这种大学系列的统帅。

以培养封建国家行政官吏为任务的中央官学，始创于汉代，称为太学。西晋以后，除保留太学外，曾设国子学，从隋唐开始，建置了管理中央官学的行政机构国子监，下分立国子学、太学和四门

学。元代分别设置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明清时期，又统一称为国子监。

太学是适应汉武帝统治政策而呱呱坠地的，它在封建社会母胎中孕育了近一个世纪。秦国自秦孝公起用商鞅实行变法以后，基本采用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治国。法家和儒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但在如何统一和治理天下的策略上却是对立的。儒家提出重士尚贤，为政以德，就是说要尊重知识分子，要招聘贤才理国，强调道德和道德教化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法家则主张尊君集权，为政以法，就是说要独尊君王，集中权力，蔑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强调法令和刑罚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两家在政治主张上的差别，导之教育实践上的严重分歧。

第一，教育的培养目标和任务不同。如前所述，儒家主张造就“内圣外王”的从政贤才，重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传统文化的学习和运用，实行“学而优则仕”的选拔人才标准。而法家极度蔑视《诗》、《书》等传统文化知识，斥之为虱子、蠹虫；仇视以文化学术求仕用世的知识分子，被称之为“游宦之民”。在国策上实行“贱游宦之民”，“显耕战之士”。即不给学诗书的知识分子以任何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而将官、爵、禄授予有耕劳和成功的农民和战士，从而引导人民“喜农而乐战”。和平时在土地上，勤耕细作；出征时，在战场上，勇于杀敌。

第二，对于道德和教化的政治功能估计不同。儒家主张，“化民成俗”，即利用道德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习惯，以求得社会秩序的稳定。法家则主张“以法化俗”，即通过严刑酷罚，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儒家大师们，无论主性善论还是性恶说，而最终结论，都相信百姓是可以教育的，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皆可以为禹”。法家认定人性恶，“骄爱畏威”，所谓“慈母有败子，严家无悍虏”。道德教育不能影响百姓心向善，唯有布下严厉的、严密的法网，形成一种既使百姓不敢犯法也无法犯法的社会氛围，才能迫使百姓守法，逐步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